

中国社会转型 与 意识形态问题

CHINESE SOCIAL
ALTERNATION AND IDEOLOGY

徐海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问题

CHINESE SOCIAL ALTERNATION AND IDEOLOGY

徐海波 著

深圳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问题/徐海波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6

(深圳大学文山湖社科文库)

ISBN 7-5004-4007-3

I. 中… II. 徐…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中国—现代②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国 IV. ①D668
②D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5439 号

责任编辑 朱 华

责任校对 海 岩

装帧设计 水 平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2

字 数 172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1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言

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在 1922 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人口占到世界的四分之一，所发生的问题即使对中国以外的任何人没有影响，本身也具有深远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未来的两个世纪里，无论中国朝好的方向发展，还是朝坏的地方发展，都将对世界的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①罗素说完这段话时间还不到一个世纪，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已经开始深深地影响中国人，也深深地影响整个世界。

中国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2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20 多年的改革开放时间，我们跨越了人类社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路程。我们用这么短时间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使中国逐步地走向了繁荣和富强，向着“小康”目标大步前进。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社会也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带来的问题。许多学者已经非常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指出，以前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通过放权让利而获得。在前一段的改革开放中，凡是容易引起社会摩擦和社会矛盾的改革都被搁置下来。在这一段改革开放中，通过对利益分配格局重新调整，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快速发展。在这段时间的改革中，总体上来说，社会

^① 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第 1 页。



各个阶层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因此，他们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都举双手拥护和赞成。随着改革继续深入，现在我们必须面对以前回避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会触动和伤害社会中某些阶层的切身利益。因此，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带来的社会震动越来越大，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①以上这些认识非常精辟。我也同样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攻坚战阶段，在新世纪开始之际，我们很有必要回头看看二十多年来的成功和失误，再决定我们的目标、途径和方法。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我把“中国社会转型期与意识形态建设”作为切入点，希望从这个问题深入进去，达到回顾和总结历史，发现和找到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我还深深感受到，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转型，不但对中国的经济生活，而且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都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它会深深影响下21世纪的中国。在社会转型期中，社会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发生一系列的冲突和变化。如果说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会影响下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那么，这种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所引起的思想意识以及观念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影响将无法估量。

① 参阅何清涟：《老百姓为什么不肯花钱》，《智囊》2000年第1期。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1)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4)
二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构筑	(16)
三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文化的创建	(22)
第二章 如何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	(31)
一 社会形态与社会转型	(31)
二 中国社会转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	(40)
三 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冲突和变化	(46)
第三章 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社会分化问题	(57)
一 社会转型期中的利益分化	(57)
二 社会利益分化与意识形态冲突的问题	(68)
三 如何重建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问题	(72)
第四章 意识形态及其基本规定	(83)
一 意识形态及其研究状况	(83)

二 意识形态的特征·····	(93)
三 意识形态的结构·····	(97)
四 意识形态的功能·····	(103)
第五章 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的研究·····	(107)
一 如何对“意识形态”做定性研究·····	(107)
二 意识形态定性研究的标准·····	(114)
三 意识形态研究与认识论研究·····	(119)
第六章 “意识形态”与科学性·····	(131)
一 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	(133)
二 马克思恩格斯对“旧意识形态”的批判·····	(136)
三 “旧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	(149)
四 科学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关系·····	(157)
第七章 意识形态与控制·····	(165)
一 系统论、控制论理论在意识形态研究中的运用·····	(166)
二 弗洛伊德的“控制”理论·····	(171)
三 控制与“自然”·····	(185)
四 “控制”与社会·····	(189)
五 “意识形态”与控制·····	(193)
第八章 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和特点·····	(203)
一 “形而上学的唯物史观”与邓小平的“实践的唯物史观”·····	(203)

- 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实践的唯物史观”的关系…………… (218)
- 三 “实践的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之间的关系…………… (239)

第一章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20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每时每刻还继续在社会各个地方和角落发生，深刻改变着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对比20多年前的中国，已经很难找到它们之间相似之处。我有时不得不面对一种尴尬状态，当我在大学课堂和学生谈起中国以前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他们会对这段历史表现出茫然不知和不可理解的神态。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不但引发社会转型和变革，也使社会大众意识的历史发生了“断裂”。

所谓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运动型式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转型，究竟是指社会向何种类型转变呢？社会转型的性质和状况如何呢？我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型社会形态向现代型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是从农业、或半工业化的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现代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从封闭或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的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这种社会转型是一次社会结构的大调整。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传统型社会与现代型社会若干方面的区别。如果要区分传统型社会与现代型社会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社会的基础产业不同。农业是传统社会的基础产业。在传统



的农业社会中，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以及与农业相关的行业的生产。而现代社会基础产业是工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商业和服务业，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超过了农业人口。

社会劳动方式不同。传统社会因技术设备简陋而主要采用手工劳动，现代社会因工业发明和科技进步而主要采用机械化乃至自动化生产。

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程度不同。传统社会只有简单的依照年龄和性别等自然特征进行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很低。现代社会有了复杂的劳动分工。社会组织的功能与结构高度专门化。

社会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不同。传统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是家庭组织和血缘关系，家庭担负着生育、生产、消费、教育、赡养、抚养等多方面功能，现代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是职业组织，家庭在生产方面的功能已经转移给社会职业组织，家庭在生活方面的功能逐渐转移给社区组织。

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不同。传统社会的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乡村社区，而现代社会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城市社区。

社会开放程度不同。传统社会因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而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和封闭性，现代社会因其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流通乃至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而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

社会管理的权威基础和主要方式不同。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以传统权威为基础，家长制管理是其主要管理方式，现代社会的社会管理则以法理权威为基础，科层制管理是其主要管理方式。

从以上两种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是一场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大变化。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这是世界各国在社会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在谈论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时，往往混淆了“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即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数量增长，于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出现了哈罗德—罗马增长模型、罗宾逊增长模型、贫困恶性循环论、大推进理论等较有影响的现代化理论，经济增长因其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而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代名词，社会现代化似乎只要走过经济增长的各阶段就可以大功告成。因此，很多的社会研究者简单地把社会转型等同于经济增长。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社会现代化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而且会受到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及人口等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因此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是已经进入发展过程的国家，还是刚刚迈入发展过程的国家，往往因追求片面经济增长，把社会福利、社会公平、文化教育等一些社会进步因素当作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导致经济增长因非经济因素的制约而出现困难局面。人们将此种经济增长状态精辟地概括为“无发展的增长”。“无发展的增长”表明，社会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只涉及经济增长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非经济因素的社会问题。于是单纯的经济发展战略被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所取代。从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转型是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同步进行的。

一些西方社会学者以西方社会为蓝本，将社会转型的主要方



面或主要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工业化。社会转型首先表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它既是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也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二是城市化。社会转型也表现为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因为城市社会是现代化社会的主要形态。工业化必然导致城市化，而城市化又必然促进和带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三是民主化。从专制走向民主也是社会转型的内容和表现。所谓民主化是指社会大众从对政治的冷漠、疏远到热情并普遍参与的过程。四是世俗化。从依附宗教到相信科学。世俗化就是打破“圣灵社会”的宿命论，相信科学和技术创新可以改造世界。对新事物和新思想采取开放态度。五是科层化。从家长制到科层制也是社会转型的内容和表现。社会组织的科层化并非现代才有，但现代组织的科层化有其自身的特征，即基于精细分工的职位专业化、根据抽象规则建立的职阶体系，以及凭借业绩升迁的准则。六是理性化。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动机从只受宗教的或情感的因素支配到遵循普遍的理性原则的转化，也被西方社会学者视为社会转型的内容和表现。

下面我们就结合社会转型的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践，认真反思一下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市场经济无声地创造着属于现代社会的一切特征。不同民族或国家因其各自发展条件不同而以不同方式或途径迈向现代化，但以

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以往的非市场经济则是每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无可选择的发展道路。

中国经历了完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因此，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的最典型、最完备的形态。自商周以来，商品经济就缓慢地发展起来，在封建社会的中晚期，江、浙、闽、粤一带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商业活动十分活跃、繁荣。但中国的商品经济却始终停留在简单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没有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一，在战国以后中国就实行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客观上土地自由买卖起到稳固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土地所有者、官宦和商人手中聚敛起来的巨大财富大都用于购置地产以扩充家族经济，很少用于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这样，中国的商品经济很早就被纳入到自然经济的发展模式中。用于农业的土地生产资料消耗了剩余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抑制了其他产业形式的发展。其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以及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对农民的盘剥，极大地限制了农业购买力的增长，从而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国内市场。由于农业购买力低下，手工业生产多局限于生活消费品的生产。生产生产资料的手工业（如冶铁、工具制造等）则因投资不足而长期停滞在小规模手工操作的水平上，这就限制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移。其三，与自然经济相吻合的、“重农轻商”、“农本商末”的文化观念使商品经济不能在社会文化价值上得到充分的认同，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取向难以同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相吻合。其四，由于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加快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社会成员间的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引



起较大的社会摩擦，冲击封建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因而历代封建王朝都实施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用官营制度垄断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经营，用严格的法律限制私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自由发展，不断扼杀从手工业和商业中萌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使商品经济一直保持其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的基本性质。从上述原因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在文化和政治的保护机制下表现出相当的保守，很难自然地、自发地转入市场经济形态。

鸦片战争爆发，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被拖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军事侵略、政治干预和文化影响以及满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屈从退让，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事实上，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从传统社会沿袭下来的私有制经济，一方面自身缺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变革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本国经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也不可能阻止国外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国外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和资本的输入，把工业文明部分地带入中国，给中国传统经济结构注入了资本主义因素，使中国部分城市和地区出现了能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工商业中心，并促使中国商品经济开始从自然经济的发展模式中游离出来，与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相连接。但是，国外资本主义势力并不想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直接的商业利益。因而这种资本主义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国传统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相反却利

用自然经济的落后性，高价销售工业产品，低价收购农产品和原材料，从中获取超额利润。在国外资本入侵影响下，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不仅其经济实力无法同国外资本相抗衡，而且其经济发展方式也被局限在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工商业范围内，很难发挥改造农业中自然经济性质的作用。这样，近代中国经济的主导成分被滞留在自然经济形态中，并与部分城市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形成鲜明对照，形成了十分典型的封建社会经济模式加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特征。此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反复发生、不断激化，导致连年战乱，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根本不存在，从而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极为缓慢，甚至停滞倒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于1949年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代中后期迅速完成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国外资本主义势力扭曲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真正恢复了国家主权，并赢得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环境。但是，在选择和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上，或者说在建立怎样的经济、政治体制以促进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上，我们走了很长一段弯路。对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一客观规律，我们缺乏正确的认识，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力图通过非市场经济模式，即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进入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在农村，我们实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将土地生产资料由个体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并将以家庭为单位



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转变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单位的集体劳动组织形式。对城市工商业，我们不断提高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不断扩大国有经济的规模。一方面改造原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限制私营经济形式、经营方式的存在；另一方面，国家通过超强积累，集中人力、物力和资金迅速发展、扩大国营经济体系。

国民经济从生产到分配的各个环节无条件地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计划，这是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各种类型的经济实体只是国家指令计划的实施单位，他们没有经营自主权，也没有属于企业自身的特殊利益。由于计划在生产领域决定一切，因而完全排斥市场的存在和市场的作用。虽然存在着一个消费品市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分配个人消费品的渠道，与生产单位没有直接联系，也不会对企业行为起直接的调节作用。这样，经济体系没有自我调节和自动均衡的机制，而是通过无所不在的行政命令体系的外在控制实现机械整合。无疑，这种经济体系必然要求中央政府对经济生活乃至全部社会生活的直接控制权和指挥权，也要求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为其提供政治保障，保持国家对各方面社会生活的绝对权威性。在思想文化领域，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必然要求社会成员在基本信念、伦理准则、政治理想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保持高度的统一和一致，并确立以反映社会共同利益、普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国家意志”或“集体意志”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并使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以此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文化整合。在社会生活中，这种意识形态被提高到极其重要的地位，排斥任何与之相矛盾、相对立的文化意识。

不能否认，这种经济、政治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

重要作用。国家通过对财力、物力的直接控制，获得了巩固和发展新政权所必须的物质条件。通过对消费需求的限制和扩大积累，集中了国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并具有相当规模的国营工业体系。国家统一的分配制度，较大程度地缩短了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减少了社会摩擦，保持了社会稳定。但是，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上看，这种体制在初期就存在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

我国农业生产力相当落后，劳动者个人在体力和智力上的差别往往会产生十分不同的经济效果，而集体劳动的组织形式在分配制度上不可能准确地体现这种差别，其结果势必削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农业生产率长期徘徊在低水平上。农业生产率低下造成购买力低，农业劳动者没有能力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再加之政策因素的约束，无法在乡村经济中发展农业以外的经济形式，这就使我国农业经济始终没有改变自然经济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高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工业体系由于失去了农村市场，绝大部分产品只是满足工业自用和缓慢扩大的城市消费，很少施惠于乡村。这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在许多方面被进一步扩大，农业现代化进程极为缓慢。而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根本谈不上社会现代化。

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性取决于中央政府能否迅速、准确地获取有关供求变化的一切信息，并及时加以处理，做出正确的资源配置。同时能否精确地预测未来，制定出没有任何遗漏的中长期发展计划，并保证计划得到准确无误地实施。然而，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现阶段并不存在实现这一条件的基础。对于我国这样一个